

# 人类学追踪调查的虚与实

## ——重访南景村的思考

孙庆忠

(中国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094)

**摘要:**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通过远足他乡的方式获得与“本文化”不同的知识与体验。这种取向不仅是专业训练的路径,也是人类学的认识论基础。对南景村的回访,重新思考了人类学村落研究的传统,以农民和村落的终结为逻辑起点,分析解读追踪调查的真义。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把村庄和对村庄的想像连在一起,构成了“虚”、“实”相间的田野工作。

**关键词:**人类学;村落研究;追踪调查;虚与实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78X (2007) 01-0084-06

这里是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言其熟悉是因为5年前我曾带着孤单、焦虑,甚至有些恐惧的心情在这个村子里行走过不下百次。在那痛苦的一年里,“城中村”的“亲吻楼”是我梦醒时分的村落意象,里弄尽头的“黑洞”是我无法跨越的“迷宫”。若不是那几间废弃的祠堂还坚守岗位见证着村庄的历史,杨庆堃先生笔下“田、园、庐、墓”的自然景观就只能承载往事的一缕云烟了。而说其陌生,则是因为这里留下过心头的痛,以至于每想到再来做调查都心有余悸。正是这种特殊的感受总是让我觉得这村子距离我的生活很遥远。我记得当年调查时发现每一条线索时的惊喜,也无法忘却每一次访谈后劳而无功的沮丧,这便是我在都市

村庄的田野经历。

.....

而今,又在自己的设计下住进了这心存复杂情感的村庄,住到了“公关伯爷婆”家出租屋的顶楼。这间几平米的小阁楼外是一个宽敞的大平台,身处其上,夜的风吹散了白天的闷热,心境的舒爽竟使今夜难以入睡。躺下又爬起,胸中燃起的是想写下点什么的热情。看着四周伸手可及的座座小楼,听着巷子里孩童哭泣和冲凉水声的音响,我才真切地感到我又一次来到了南景——这个因杨先生的著作而有名的村落。所不同的是,此次重返不只是对杨著的跟踪调查,也是对自己熟知村落的重访。房东伯母见面时的一声“阿忠”,让我甚感温暖,这是小阁楼工作的

收稿日期: 2006-10-21

作者简介: 孙庆忠(1969-),男,辽宁沈阳人,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

第一声“念白”。白天穿行于村中，细细辨别又已更换了门楣的街巷，当年踩着单车跑来跑去的情形又清晰地呈现于眼前。也许，这就是人类学赋予给我的一种生活，一种在时空穿行中寻找自我，探问文化意义的方式吧！

——2005年7月17日田野调查笔记

## 一、乘坐地铁到田野

柏萨洛（Joanne Passro）有篇论文题为“你不能乘地铁去田野：地球村的‘村落’认识论”[1]（P150-166），意在挑战传统人类学知识对“距离”和“他者”的建构。颇具巧合意味的是，我此次的南景村之行恰恰是从广州火车站乘坐地铁抵达的。当然这只是形式的相似，而并非内容的相同。地铁是现代化大都市的一个表征，在惯常的想像中它与赶赴村落调查实在是难以协调对接，然而，不容置疑的是20分钟后乘滚梯走出地铁口，熟识的西街牌坊就在眼前。半世纪前的城郊聚落就在宽敞街道的近旁，就隐没在高楼大厦之间。这就是我跟踪调查的村落，人类学研究固守的田野。

缘起于杨庆堃先生1948~1951年的调查[2]，南景村成为了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名村。20世纪80年代，与珠江三角洲村镇企业发展同时，对南景村的跟踪调查被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视野[3]。20世纪90年代，在乡村都市化的背景下它又为人类学同仁所钟爱[4]。而我的调查则意在回应前辈的学术研究，记录华南乡村社会的变迁轨迹，以及与此相伴生的乡民文化的失落与重建。正是这些接替性的后续调查，呈现了都市近郊村落巨变的形貌。2002年10月1日，广州“城中村”的村民统一转制为城市居民，南景村划归凤阳街道管辖，1725名村民被编入城镇居民的行列，并以此宣告了农民身份的终结。此时，尽管村庄的故事还在上演着，但地理意义上村落终结的脚步却已临近。南景周围是新近开发的花园社区，它们蚕食并围攻着钢筋水泥打造的村庄。再过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这里将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村落，人们将无视它的现在，就像此时听闻它昔日田园景致时流露出的惊讶与漠然。以此观之，人类学的追踪调查魅力独具，它不仅延续了前辈著作的学术生命，也使我们目睹了农民终结与村落终结的演进历程，更可

作为“小地方”与“大社会”命题的佐证。仅就南景不同时期所有制的变革来看，这个普通的村庄从地主所有制下的小农经济，到集体化时期的土地公有，从村社所有制下的家庭承包，到以股份制为标识的经济共有，几近是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道路的缩影。它独特的地缘优势又使其经历了乡村都市化的洗礼，在城市文明的浸染下，村民经历了自卑中的翘首期待，也饱尝了自信中的怡然自得，而这又是珠江三角洲大城市边缘村落的共相。因此，这里凝缩了华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全息图景。

南景村的生命史即将收笔，对它的再研究是否也走到了尽头？我的重访因熟知杨先生的人健在而缩短了与他们心灵间的距离，因老照片唤起了村民尘封的记忆而有了不期而遇的温度，那么，他年之后人去楼空只留一声叹息、时境过迁空有一份记忆的时候，对于跟踪调查和人类学的思考而言，它的价值又将体现在哪里？南景村的历程能否成为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学传统、思考田野工作的一个逻辑起点？

## 二、“田野”的界限与村落研究的“合法性”

田野调查是了解人类文化行为的基本方法，也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它是人类学产生新知的策源地，也是衡量“真正人类学家”的尺度。然而，“尽管‘田野’的概念对我们的学科和专业十分重要，但是‘田野’在当代人类学中仍然是一个没有探讨的概念。……‘田野’本身以及人类学家所从事的别具特色的‘田野调查’地点，即‘他者’文化或社会所在的场所，是否有待于人类学家的观察和描写呢？这个神秘场所——不是人类学要研究‘什么’，而是人类学该在‘哪里’从事研究——虽然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却在人类学反思的范畴之外”[5]（P2）。

### 1. “田野”的定位与意味

人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以“异文化”作为研究的对象。为了理解不同境遇下人类的生存状态，为了记录文化和解释文化，研究者要参与到被调查对象的生活中去，通过这种远足他乡的方式获得与“本文化”不同的“异文化”的体验。这种取向不仅是人类学专业训练的惟一路径，也是被视为“公理”的人类学的认识论基础。

人类学关注“他者”，而他者所在的“田野”都远离西方本土。这种定位延续了14世纪以来的“东方学”传统，强化了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的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因此，在西方民族中心主义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古典人类学，其研究对象本质上是以非西方世界为目标的。20世纪的人类学虽然仍以包括亚、非、拉美和太平洋岛屿等地的研究为鹄的，但在学术取向上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学者们对别样文化形态、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观察，目的是思考自身文化的局限，从而提升了“异文化”研究的品质。人类学也因此又被视为一门借鉴“异文化”来反思和批评自己的启蒙学科。然而，无可争议的是，人类学研究时至今日依然背负着殖民时代的传统。从“田野”的选择到对“田野”的理解，始终还有特洛布里恩（The Trobriand）的影子，也不乏对努尔（The Nuer）社会的想像。“田野”在这种意义上也便成为落后蛮荒的专指，成为远离工业文明和都市社区的乡民社会的代名词，尽管人类学并未宣称拒绝研究城市文化。

## 2 人类学村落研究的传统

关注底边社会的学术传统使村落研究与人类学有了不解之缘。20世纪30年代，深受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派克（Robert Park）和英国结构—功能学派大师布朗（A. R. Radcliffe, Brown）在燕京大学讲学的影响，在吴文藻先生的倡导下，社区研究成为落实“社会学中国化”主张的有效途径。而费孝通、林耀华、许烺光、田汝康等一批学者的研究实践也使人类学和社会学在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土壤里实现了结合，促进了中国村落研究的规范化，也使村庄研究在中国人类学和乡村社会学领域拥有了“合法化”的地位。杨庆堃对广州市郊南景村的研究，采用的正是功能理论和社区研究方法，是燕京学派落下帷幕前的最后一部著作。

如果我们把村落研究放在更为广阔背景下考察就会发现，在燕京学派之前有美籍教授葛学溥（Daniel H. Kulp）指导学生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的社区调查[6]，有“乡村建设学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村落社会调查，它们都为中国人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后的50年代至70年代，正当大陆人类学研究沉寂之时，台湾和香港立足于村落的汉人社会研究却成绩斐然。近20多年来，海外人类学家对村庄的

关注，成为了学科发展史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些深入体察农村社区的人类学研究，虽然还是关于村庄社会生活的描述，但是它们已经不再局限于一个村庄如何反映整个中国，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村庄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与此同时，大陆学者的研究也使村落研究成为了人类学东西方学者思想交汇的平台[7]。凡此种种，都为人类学的村落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那么，为什么乡土中国研究的基本单位就是村落？其方法论的依据在哪里？费孝通先生基于对江村的研究认为，村落就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8]（P5）。他将江村作为全面了解中国农村、认识中国社会的一个起点。这种用“小地方”反映“大社会”的研究取向虽然遭到了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造就出一种新式的区域人类学传统”的挑战，以及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将农村集市视为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基本“网结”的诘难[9]（P6-9），却始终没有动摇村庄民族志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相反，村落研究的“合法性”却在新一代学者的开拓与创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三、“人类学家并不是研究村落，他们是在村落中研究”[10]（P25）

人类学的“田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地点。人类学家进入田野，期望从他们的脚下获得泥土，像其他的“田野科学家”一样，他们旨在发现由“凌乱的”、“血肉般的”、“扎实的”等形容词反复描述的现实生活[5]（P10）。这种对田野的期望与预设，在我两度对南景村的跟踪调查中体会尤深。但是，它与羊城村、珠江村所共同面临的现实——村落的终结，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定位我们的田野？如何界定我们的专业特色？也就是说，被都市街区消解的南景使村落研究的“合法性”问题受到挑战，那么，人类学是否应该退避三舍，应该放弃这块“田野”？换言之，人类学是否只能研究村落，是否面对都市就束手无策？有形的“田野”和没有地域边界的“田野”对人类学的研究又意味着什么？

## 1 田野追踪与村落研究的真义

5年前我曾执着于南景有形村落的辨别,认为只有明确这道可视的边界才不失跟踪调查的本色。其实,我们对社区边界的关注,不外乎是以实实在在的“村落”来确证调查的专业身份。而今,面对着这已被肢解行将终结的村落,设想着后来者对南景的再研究,人类学的标签又将贴在哪里呢?就社区自身的变化而言,南景与广州139个城中村有着大致相同的发展轨迹,村庄的内部形制也基本相同。那么,我们选定这个有着学术前缘的村落进行跟踪调查的意义究竟体现在哪里?庄孔韶在总结8个著名田野点的人类学再研究时指出,从人类学关心社会文化变迁的主题来讲,相对于平静的社区,对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历过巨大社会变故的社区的回访工作更值得。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取向和极具理论价值的学术实践路径,回访不仅可以重新找到审视同一调查点的机会,也延伸了先驱者作品的学术生命与意义[11](P490)。王铭铭在重访西南联大时期三个人类学调查地点后认为,在旧有的田野工作地点进行跟踪调查,有可能比较完整地把握被研究社区的旧貌和新颜。同时,也提供一个理论思考的空间,使我们能重访老一辈人类学家的“故地”,在那里追溯社会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时间线索,在继承和发扬前辈的学术事业的同时,联想更广泛的学科问题,提出我们自己的解释,达到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反映我们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和心态的变化”的目的[12](P109)。

事实上,跟踪调查的魅力还在于它打破了社会人类学家对平衡论的偏爱,以一个可以比较的时间点再现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再现历史意义上的当地社会。以南景村视之,杨先生的调查描述的是政治革命影响下中国南方乡村社会的图景,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城郊乡村的社会形貌。而我的再研究记录的则是在经济变革的时空场景下村庄的又一段生命历程,是90年代末乡民社会在都市生活中分化与整合状态的表述与传达。因此,我们的追踪调查表面上是对村庄故事的续写,其实质是对新知的记录与开掘,是故地新知,是旧瓶新酒。然而,在这前后50年的对照中,我们发现了后生的文化形态中源于前者的文化积淀,也目睹了乡民文化次第消长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南景村的追踪研究,为都市人类学面临的挑战,即探求乡村社

区与都市的关系,解释乡民的文化模式在都市的转变,提供了富有解释性的证据。

从后辈对前辈学者调查点的寻找与再研究中可以看出,人类学的“田野”始终是虚实相间的。前辈赋予调查点化名或学名的出发点是由“实”转“虚”,后来者剥离“迷雾”解开学术疑案则是由“虚”转“实”。那么,这虚虚实实的“田野”对人类学研究到底意味着什么?南景村的地域边界行将消失,但不会因此走出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它与边界尚存的江村、禄村、台头和西镇等村落一样,承载着人类学家所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依然是人类学研究的“田野”。由是观之,人类学研究的不是有形的地域边界,而是那块“田野”里出产的“地方性知识”。换言之,我们所跟踪调查的村落是“实”的,但相对于所要揭示的问题它是“虚”的。应该说,正是在对田野知识所隐含的深层意义的解释中,才使我们专注的小村落拥有了代表性的意义,拥有研究的价值。

## 2 飘移的“田野”与人类学的作为

南景村民身份的终结和村落地域边界的行将瓦解,使我们想像的“田野”和与之相配的乡民文化正在远去。而我们所关注的田野事实,却又以新的形式凸显出来。南景所属的行政村变成了经济发展公司,南景下属的6个经济合作社是昔日村民分得红利和享受社会福利的主要来源。作为股东的村民,无论分散到城市的哪个角落都享有这份可以继承的股份。这种新的经济共同体,是南景留下的没有边界的“村落”。与此类似,基于血缘、地缘关系构成的社会边界也将以清明拜山祭祖这许多年信守仪式而延续往昔村落的功能。村民共同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惯习”,是建构这种多元边界的内在依据。以此观之,我们的“田野”不会消失,只是转化为另一种存在状态而已。正如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所说:“文化在我们探询如何去理解它时随之消失,接着又会以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新出来了。”[13](P141)而且南景村的这种状况也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在金翼黄村,上演在西南边陲的那目寨……。

2000年在第一次对南景村的调查之后,我曾有这样的判断:“都市村庄是双栖型地域,既有乡民社会的特点,又是在都市浸染中成长起来的村落。因此,对它的研究可以视为人类学走向

都市研究的过渡性桥梁，也是我们得以展望人类学都市研究和回首传统人类学方法的一个栖息地。”[11]（P376-377）从反思“田野”的角度来看，这种认识大有把都市人类学限定在唐人街、浙江村、旧街市和都市移民区之嫌。都市社会研究被视为人类学继原始民族研究和农民社会研究之后的第三次革命，但大多数的研究与其说是城市人类学，不如说是城市中的人类学。城市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了研究工作的场所而不是研究工作的对象。就像坎克里尼（Nestor Garcia Canclini）所述，作为人类学家，务必不要退缩到聚居区或“社区”的虚幻的独立的王国中去。……人类学家长期使用的方法阻碍了一种把城市生活意义的广泛图景包括在内的城市人类学的创立[14]。看来在城市文化的强辐射下，在信息网络遍布“地球村”的时代，我们所重新思考的不只是“田野”与方法，更要思量人类学的命运和前景了。

人类学研究“异文化”，对“他者”的关注是人类学永久的主题。在网络化、信息化的今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令人类学家们苦心探问的“他者”，正通过网络参与着“地球村”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地域性的文化也在人群如潮的流动中重组了格局。人们在生存与发展的理念下新编着传统，再造着文化。在我们的身边就是各种类型的“新客家人”，他们的故事也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在一个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ed）的世界中从事去殖民化（decolonized）的人类学研究意味着首先要屏弃传统‘人类学’田野对遥远的、异国情调的偏好，突出人类学家对研究地区的历史和社会的关注。”[5]（P46）可见，只有在重新思考“田野”观念，重新定位“田野”场域之后，我们才能获取不同类型的人类学知识和人类学研究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地球村时代的文化真的就像“善变的河流”，那么人类学者的田野就必然是那“漂移不定的湖”了。

#### 四、补述：“田野”里的乡愁

乘地铁去田野的日子告一段落，接踵而来的是在书斋里回味那里的人、那里的事和已留在了那里的感受。田野思绪是繁琐的，但头脑中的记忆却是清晰的。我以“虚”与“实”来总结对南景的追踪调查，意在说明我们曾经固守的田野

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物去人非这是生活的规律，也是社会巨变的必然结果。我们在往事钩沉中从村民的记忆里“拯救”村庄的历史，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梳理”乡民的思维逻辑。“他者”与“他者的故事”也因此成为我们守护人类学家家园的资粮。然而，如果抛弃人类学知识理念对“田野工作”的前期预设，走出地铁口的一瞬，看着与我家门口相似的景观，我不会想着这里是异域，是他乡。那么，到底是回归日常的田野场域走出了人类学的界限，还是人类学的“田野”认识论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我们通过对“田野”传统的回顾，通过对跟踪调查及其学术价值的探讨，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在对南景村的重访中，我还体会到有一种情感不容忽视，它连接着历史与现实。这种情感既包括被研究者对失落文化的追念，也包括研究者存留文化的欲望和田野中不时撩起的怀旧情思。在我的调查中，有南景村民在农村承包果树而重抄旧业，有个热心人的阿标叫上摩托带着我去龙潭村遥想南景昔日的风景。而事实上，人类学者对前辈学者田野点的重访，无论是庄孔韶影视作品《端午节》的拍摄，周大鸣寻找凤凰村的初衷，还是兰林友“庙无寻处”的感慨，都与村民对自己历史的追忆一样，是对一段心路的怀念，是对学术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人类文化法则内在意义探询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村庄和对村庄的想像连接在一起的正是这份绵延不绝的乡愁。

#### 参考文献：

- [1] [美]柏萨洛. 你不能乘地铁去田野：地球村的“村落”认识论[A]. [美]古塔·弗格森. 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C]. 骆建建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 [2] C. K. Yang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R]. Mass. The M. I T Press 1959.
- [3]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社区研究论文集[C]. 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编印，1985 何肇发. 珠江三角洲集镇与居民——社会学的社区研究[C].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
- [4] 周大鸣. 中国乡村都市化[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周大鸣，高崇. 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研究——广州南景村 50 年的变迁[J]. 社会学研究，2001（4）.
- [5] [美]古塔·弗格森. 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

- 场所的人类学“田野”[A]. 古塔·弗格森. 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C]. 骆建建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 [6] Daniel Harrison Kulp II *Count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es, Volume I Phenix Village Kwangtung China*[M]. New York Cit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5.
- [7] 孙庆忠. 海外人类学的乡土中国研究[J]. 社会科学, 2005(9).
- [8] 费孝通. 江村经济[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
- [9] 王铭铭. 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10]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 文化的解释[M]. 纳日碧力戈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11] 庄孔韶等. 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12] 王铭铭. 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13] [美]马歇尔·萨林斯. 甜蜜的悲哀[M]. 王铭铭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 [14] [墨西哥]内斯托·加西亚·坎克里尼. 世纪末的城市文化: 人类学展望[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1998(15).

(责任编辑 何斯强)

## The Imagination and Reality in the Follow-up Anthropological Investigation: Reflection on a Revisit to Nanjing Village

SUN Qingzh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10094, China)

**Abstract** Anthropology in its expedition of taking “other culture” as the object of study obtains it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different from “local culture”. This approach is not only the means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but also the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of anthropology. The revisit to Nanjing Village has made the author hav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village research tradition in anthropology. The author takes the farmers and the village as the logical departure and explores and interprets the true meaning of such investigation. The researcher and the researched have combined the actual village with the imagined village, thus forming a field-study integrating imagination with reality.

**Key words** anthropology; village study; follow-up investigation; imagination and reality